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试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和贡献

姜 文 湖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一、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创造理论。伟大的中国革命，不但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需要使之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切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国理论。

二、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巨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逐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国基本问题的认识，经历四个时期的不断探索，依靠全党努力和集体智慧，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体系。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土壤而形成的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为创立这一理论，花费了廿五年作出了伟大贡献。他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和两步走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和革命转变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战略部署和总路线的理论，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等，正确回答并深刻论证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必须经由新民主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它是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在条件成熟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理论体现的科学思想和提出的指导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试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和贡献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和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个理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领导、前途和革命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但正确地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应该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而且正确地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在条件成熟时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变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虽然象闪亮的流星似地匆匆消逝，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党在长期理论探索中郑重提出并深刻论证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却依然闪烁光芒，它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和提出的指导原则，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这一理论，了解它形成发展的漫长过程，认识它深刻的内容和毛泽东为此作出的伟大贡献，不但有助于加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和我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

这一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且也可以帮助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由来的理解。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八十年寻找救国真理的痛苦经历中，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这种认识和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但在当时对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讲，这种认识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实践体验，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色彩。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它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但却没有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国提供现成答案。它的生机和力量在于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系，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由于中国的国情和欧美国家不同，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导一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经济文化都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运动，并将其引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来解决。无疑，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艰巨任务。

党的早期活动，因为理论准备和对国情了解不足而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党的一大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提出了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党的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规定党在现阶段的主要斗争纲领是反帝反封建，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改变了一大的结论，在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设想，表明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迈出可贵的一步，为全党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党的二大没有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由于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的复杂关系未能做出科学解释，因而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党的三大作出联合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决定，但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5年1月党的四大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得到胜利”^①，但这种认识又以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为前提，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看成一种“自然的趋向”，忽略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任务，因而在实际上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此后数年，党对中国革命基本理论虽然继续进行探索，但因没有搞清楚两个革命阶段的复杂关系，就全党来讲，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尚属模糊不清，这是党内出现“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陈独秀没有认识时代条件变化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划分为不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形成

“二次革命论”观点，从而在政治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策略，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惨重失败。1927年初，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批判了“二次革命论”，认识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之政治环境”^②，表明党对民主革命未来前途有了新的认识。但随着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党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以至开始出现“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主张^③。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后，历次“左”倾领导者都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与界限，过分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乃至把它看成敌人，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主张民主革命“必须实现于反对已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④，并由此规定了一系列“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灾难，几乎使党陷入绝境。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革命是不会胜利的；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能使之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革命依然是不会胜利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创造理论。伟大的中国革命，不但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需要使之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

二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巨擘。他敢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悉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逐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依靠全党的努力和集体的智慧，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从探索、形成到完善，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阶段。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还没有条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全局性的理论思考。但他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依然发展了党的二大至四大决议精神的主导方面，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1925年11月，他在回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提问中，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的力量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及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随后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两篇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辩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理论观点：一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不仅肯定其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对其两面性作了初步分析，指出它们“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具有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的矛盾态度。二是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毛泽东一方面明确指出：现在的革命，与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

仅仅是一个幻想”，他们“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⑤；另一方面他也没把社会主义当作现阶段革命的直接目标，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实现“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⑥。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已经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蕴含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的萌芽。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认识上的缺陷，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贯彻到底，在指出其即将分化的事实之后，没有说明跑入反革命派的那一部分是动摇还是叛变，是附合了敌人抑或自身就是反革命派，是否还能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即使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在当时也还没有被全党所接受，特别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更是如此。

第二阶段，基本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阶段。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中，接连三次遭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先后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界限，都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提出了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从实际出发，把革命重心转向农村，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并在总结各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复兴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强调“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⑦。并认为只有实行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⑧。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使他有条件总揽全局，继续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理论问题。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著作中，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化了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对民族资产阶级，他进一步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作了严格区别，更加全面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产生根源，明确指出其两面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⑨，不是后天才有的。即使他们当中一部分在1927年附合了蒋介石的反动，他们也仍然具有两面性，仍然不是革命的敌人，仍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争取他们转向中立，甚至参加革命。这种认识表明毛泽东已经树立了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具有两面性的观点。

（二）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第一次提出了革命转变这一新概念，明确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他说：“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至于转变的方式，他认为我们应该力

争“不流血”的和平转变，“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⑩。转变的时间则以是否“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和是否“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为标准。他强调：“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时间会要相当长”，“不应当轻易谈转变”^⑪。

（三）对民主革命的直接目标，他在纠正党内“左”倾思想、总结根据地建设经验之后，提出了“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并宣布这个共和国仍然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但同时也要“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他强调这个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⑫。

毛泽东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所取得的上述这些思想成果，深化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阐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三阶段，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日寇诱降方针下，逐步走上反共投降道路，开始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宣传。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拥护全民抗战，但在抗日与民主问题上摇摆不定，往往采取依违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立场，幻想在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寻找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大资产阶级反共、民族资产阶级摇摆的情况下，为了阐明党的关于革命建国的理论和纲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谬论，教育和争取同盟者，以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毛泽东从1939年至1940年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系统分析国情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领导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已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充分展开，深刻论证，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由三方面内容构成：

（一）在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具有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科学概念，建立起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和革命转变的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把两个革命阶段连接起来，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

（二）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的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以及谁来领导和领导谁的根本战略策略原则。

（三）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两个概念，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出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共和国里，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⑬。并强调了中国革命前途必须经由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结论。

第四阶段，发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和政策的阶段。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针对国共两党关于建立什么国的争论，毛泽东把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思想推进到新的阶段。他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阐明民主革命胜利后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的必要性。他指出：抗战胜利以后建立的国家，第一“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已为国民党统治所证明是破产了；第二，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这种制度已经过时了；第三，“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只能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⑭。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了在中国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种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⑮。既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出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明确表示：这种矛盾“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⑯。并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⑰。

党的七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上述指导思想，并没有为全党完整理解。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行和人民解放军对城市的占领，仍然发生了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左”的倾向。因此，1947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着重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⑱，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总目标，如果违反这一方针，“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⑲。毛泽东这个报告提出没收官僚资本，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重要条件。这个报告以及会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体上纠正了已经出现的明显的“左”的偏向，但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片面强调保护资方利益等右的偏向。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会议的决议中，对中国基本国情作了更进一步分析，对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了更加具体、更加全面的论述。

七届二中全会没有急于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全会虽然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提到全党面前，但却依然坚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强调在主要帮助国营企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

发展”^{②0}。对城乡资本主义既应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同时也不能“限制得太大太死”，要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②1}。七届二中全会在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在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中介，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此，毛泽东在长达25多年漫长岁月里，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伟大的科学思想体系。

三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土壤而形成的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关于这一理论的论述，正确地回答并深刻地论证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经由新民主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规律性问题，从而以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补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理论贡献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来讲，其主要贡献是：

（一）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阶段，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必须经由新民主主义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这里强调区别，就是强调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首先完成民主革命，“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②2}；而不应把两种革命混同起来。这里强调联系，就是强调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互相衔接，一切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②3}，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共产党人“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②4}。

（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点，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保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革命按其革命阵线来说，已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考察了中国革命所处的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使用了新民主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②5}。其“终极的前途”是社会主义^{②6}。这里，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接替资产阶级承担了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掌握了革命领导权，这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当然，无产阶级领导权只有在同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活动进行反复较量并得到胜利之后才能取得，只有把农民革命要求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才能确立和巩固。党的历史上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或者因为不敢同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动作斗争，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或者因为不敢支持农民革命行动，

而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都曾造成革命的严重危机而招致失败。所以毛泽东一直强调这个问题，不断同反对、放弃、削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言行作斗争，认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权，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②7}。

（三）制定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规划了中国革命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根本战略部署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形成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化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经典公式^{②8}，这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高度概括。这种概括，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这里，反对封建主义，与一切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同的，只是更为坚决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则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独特性。这种概括还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社会基础，动力是人民大众，主体是工人和农民。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工人阶级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因其具有两面性不能成为革命的主体，更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总路线解决了革命的这一首要问题。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②9}。

（四）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互相关联的根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总结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③0}。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一定条件下（比如抗战时期）还要把部分大资产阶级包括在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一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并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时，由于中国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内部没有民主制度，革命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和革命的胜利。所谓武装斗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无产阶级不但必须以其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的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而且还必须深入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实行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任务，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③1}。所以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③2}。

（五）制定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描绘了建设新民主主义

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毛泽东一再指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应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但这个纲领的实行，并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衔接两个革命阶段的中介，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途径，从而建构起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其基本框架是：

1.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又有新质的不断增加，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移易的“过渡的形式”^③。

2.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它不是专政对象，而是联合对象。

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领导、包括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经济结构。

4.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也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适应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并为之服务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

5.新民主主义的对外关系，既要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又要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尽可能地包括同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人“做生意”^④。

6.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是创造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主要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去创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由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极端重要又十分艰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此，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绝非转瞬即逝的历史现象。对此，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指出过，后来又多次重申，他说：“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⑤。

以上可见，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并在结合中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国的胜利，进而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为世界上众多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由新民主主义而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从而以中国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作出了独特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它更加熠熠生辉。

注释：

- ①《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74页
- ②《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页。
- ③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的问题》，《六大以前》第695页。
- ④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41页。
- ⑤《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5页
- ⑥《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1926年第4期
- ⑦《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9—80页
- ⑧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83页。
- 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页。
- ⑩《为争取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页。
- ⑪同⑨，第155页。
- ⑫同⑨，第154页。
- 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
- 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 ⑮同⑭，第1061页。
- ⑯同⑭，第1057页。
- ⑰同⑭，第1081页。
- ⑱《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 ⑲同⑱，第1255页。
- 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 ㉑同㉑，第1433页。
- ㉒《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 ㉓同㉒，第659页。
- ㉔同㉒，第646页。
- ㉕同㉒，第661页。
- ㉖同㉒，第645页。
- ㉗同㉒，第646页。
- 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1页。
- ㉙同㉘，第1314页。
- ㉚《‘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
- ㉛同㉚，第604页。
- ㉜同㉚，第597页。
- ㉝同㉚，第668页。
- ㉞《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
- ㉟同㉞，第1063页。